

慷慨悲歌语境下的河北红色经典

□向回 金景芝

河北地处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碰撞融合的交叉地带,因春秋战国时属燕国和赵国,故别称“燕赵”。纵向看,燕赵地理区划以今黄河为南界,太行山、燕山山脉为西界和北界,包括今天京津冀全境及山西、山东、河南、辽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在这个区域之内,慷慨悲歌既是一种普遍而又典型的价值观念和人格风范,亦是一种悠久而又稳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虽然任何地区都不乏“慷慨悲歌”的历史人物和现象,但唯独燕赵大地以之为地域文化的特质,因为它早已融入了绝大多数燕赵志士血液中的价值观念。古往今来,燕赵大地的人们以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跌宕起伏的慷慨悲歌。

慷慨悲歌作为燕赵文化的特质与标识,是在燕赵大地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诸族争霸、战事频仍的政治情势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深深植根于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之中,体现于民风民俗、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之上。它能作为燕赵文化精神的核心和特质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既有赵武灵王、蔺相如、容城三贤等社会精英阶层的率先垂范,亦有程婴、公孙杵臼、荆轲、郭解、大刀王五等市井豪杰的身体力行;既有荀子、董仲舒、颜元、李塍等思想家,亦有建安文学、北朝民歌、盛唐边塞诗、宋元杂剧及河北梆子、武强年画、吴桥杂技等文学艺术。可以说,因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燕赵儿女在战天斗地的生产生活中,主体心灵与外界环境发生强烈撞击,将“大率气”和“勇尚义”连为一体,生成了豪迈粗犷、忧愤悲愤的主观世界特质,塑造出义薄云天、气贯长虹、壮怀激烈、力主笃行的人格形象,使燕赵大地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慷慨悲歌的民风民俗,也使燕赵儿女固化了单调而又严峻、崇高而又阔大的思维习惯、审美心理和审美感受,并在后世的审美过程中又以审美经验形式出现,成为他们审美判断

的基础。所以,燕赵儿女普遍心胸宽广,喜好刚毅雄强、粗犷豪迈的悲壮之美,也喜好具有慷慨悲歌风格的文艺。

慷慨悲歌精神是燕赵文艺之根与风骨表征,其在诗歌、小说、曲艺、美术、影视创作中的传承,主要表现为一种关爱苍生的悲悯情怀。纵观诗歌发展史可发现,燕赵诗歌慷慨悲歌风格的形成,在于燕赵诗人对社会苍生的积极关注,故诗中时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北朝民歌如《李波小妹歌》《木兰辞》《敕勒歌》《陇头歌辞》《企喻歌》《幽州马客吟歌辞》等,也无不体现了燕赵口头文学所具有的粗犷质朴、高亢激越、豪迈奔放等风格情怀。它们与北朝边塞诗一起,为盛唐边塞诗着一先鞭。赵翼《瓠北诗话》云:“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高亢、豪迈、悲凉、激越的河北梆子,是最能代表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剧种。河北梆子是“秦腔”来到燕赵大地绽开的艺术奇葩,山陕商人带来的秦腔有一种豪迈激越的风格,正符合燕赵大地的人文性格,其与燕赵本土的语言、音乐相结合,便演化成了后来唱腔慷慨激昂、凄楚悲壮、声如裂帛、铿锵有力的河北梆子。燕赵特有的器乐艺术吹歌,音色嘹亮,热烈欢畅,高亢奔放。武强年画构图饱满,线条粗犷简练,劲道健美,色彩强烈,内容多为表现人民好恶爱憎的武打故事。这些明显具有慷慨激昂、棱角分明的燕赵风骨的艺术形式,是燕赵慷慨悲歌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无不见出燕赵文艺的主要特质。

河北地处华北抗战前沿,“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抗战期间,中国共

产党先后在河北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冀中、冀热辽、冀南、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此外,还在平汉路以西、石太路以南建立了冀西特委,在津浦路以东、天津以南的津南地区建立了冀鲁边工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河北在抗战中具有战略性,是敌后抗日的主战场,河北人民也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各种抗敌方式层出不穷。燕赵儿女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以一桩桩撼天动地、泣鬼神惊心的战斗事迹,谱写了一曲曲为国为民、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与壮丽赞歌,把燕赵文化中的慷慨悲歌,衍化成了一种感天义、急国难、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热忱,极大地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燕赵大地扑不灭的抗日烽火和燕赵儿女沸腾激烈的热血壮志,成就了田间、方冰、曹火星、孔犁、袁静、孔厥、徐光耀、冯志、雪克、刘流、李英儒、管桦等现代作家,也为我们留下了《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歌唱二小放牛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荷花淀》《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英雄雨来》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红色经典。在诸多河北红色经典中,无论是战争年代宣传教育与鼓舞激励民众积极抗战的诗歌、戏剧,还是在平时时期反映燕赵儿女抗日斗争的史诗性长篇小说,无不是伟大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的最好诠释,彰显出慷慨悲歌文化特质在文艺上的一脉相承,是燕赵慷慨悲歌文化土壤中绽放的文艺之花。



□苏虹 郑悦

在河北作家谈歌的小说中,共产党员是其关注和着意表现的审美对象。数量众多、丰富立体的共产党员形象的成功塑造,与谈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对共产党员的深刻理解密切相关。

首先,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建构上,突出英雄化、传奇化。在谈歌笔下,许多共产党人成长曲折、经历坎坷、能力较强,极富传奇色彩。谈歌很好地将英雄、传奇与庄严的历史相结合,使情节曲折有致、精彩异常又显大气磅礴。《家园笔记》中偏于霸气、威武的二姨,匹夫不可夺其志的大舅,革命经验不足但毫无私心的周一凡,他们都有传奇经历和英雄色彩。三舅的经历更凸显我们的英雄格调,他参加北伐、领导红色暴动、组建苏维埃政府,在与以亲生父亲和兄弟为代表的敌对阵营的对抗中,他立场坚定、冷静刚强,作风果决,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革命可能面临的功亏一篑,最终,三舅率部“用血和命为转移队伍荡开一条路”。三舅的形象表现了野民岭人的血性,彰显了英雄气概,也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票儿》中的主人公从泉雄到革命烈士,从“江湖”到“正道”的人生转变,与共产党的引领密不可分,小说不直接写政治,却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大舞台》塑造了梅三娘、梅天凤、郭子路、甄广宁等各具特色的共产党员形象,其中最成熟的代表是杨昆平。小说将其放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中,放到与军统和日本特高课刀光剑影的冲突和较量中,从而展现其经验丰富、坚定勇敢、忠诚智慧的英雄形象。有这样优秀的共产党人领导,才有梅三娘、梅天凤等的义无反顾,他与军统特工马凯旋棋逢对手的斗智斗勇才更加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其次,叙述话语和立场的民间化、人性化。谈歌深刻理解共产党员形象代表主流价值体系,只有这种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才能引领大众的思想认识和价值选择。因此谈歌多站在民间立场,采用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巧妙地把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或置换为人性、伦理和个人情感,使人物充满世俗化和人情味,从而更好地与大众形成有效互动和共鸣。小说中没有高大上的政治名词或空洞教条的政治理论,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日常化和生活化。比如《大舞台》既写了白悦农的立场坚定、壮烈牺牲,也写了她重情重义、对爱情和幸福的大胆追求;《桥》中老汉对小伙子的两次“吼”,看似冷酷,却最深情,有人民至上也有爱子情深;《大厂》中的管理者吕建国,丝毫没有“官瘾”更无领导架子,他在大厂问题百出、风雨飘摇时选择留下,并非有政治欲望,而是完全出于对工人、工厂的热爱,虽不能力挽狂澜,但绝不随波逐流。这样将政治话语与人性化相结合的形象才更真实、鲜活。没有把人物符号化、政治化,更没有神化,这是谈歌小说中共产党员形象成功塑造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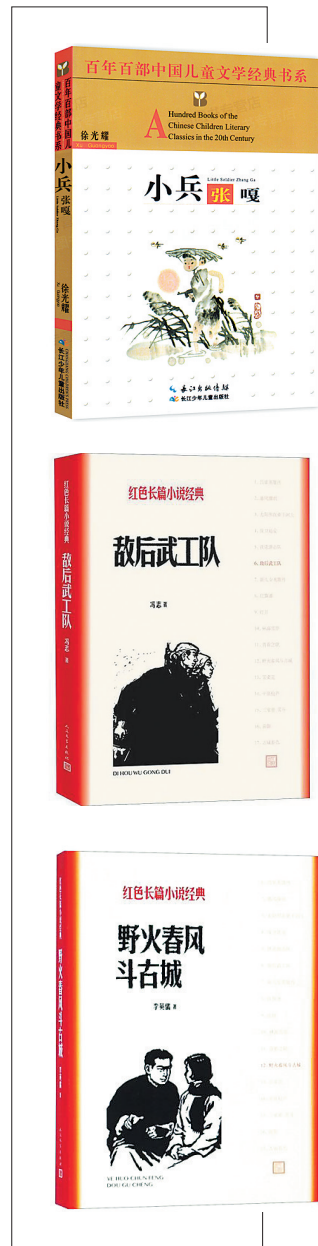
最后,善于塑造特殊时期的共产党员形象,并展开有深度和思辨性的议论。谈歌是一个有责任心和忧患意识的作家,他勇于正视历史,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都市豪门》通过袁家梁帮助黄超聘请保姆的一处细节,表明了黄超有原则、有底线,对无处不在的拉拢有自己的姿态。谈歌没有用“理”与“情”混为一谈、接受糖衣炮弹、走向腐败的常见套路,而是赋予人物警惕性和防微杜渐意识。防腐拒变的黄超是看似所向披靡的袁家梁真正敬重、真正惧怕之人,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们党的威信和强大的感召力。小说通过袁家梁的发迹,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关系网、腐败等现象。也正因此,身在权力之中却始终坚守原则的黄超才更让人肃然起敬。《天下荒年》塑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时期各种共产党员形象,有以死维护自我尊严的“父亲”,淡泊名利、超然从容的三伯,宁愿受罚也要调拨军粮救急的司令员,深明大义、自己扛下所有后果的军需处长,严于律己、开山造田的大伯,主动申请修水库、处处起带头作用的普通妇女袁娘等。特殊时期的众多事件,考验着极致状态下的人性和道德,也彰显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高贵灵魂。小说明确了召唤道德理想的目的:“忘记那个时代就意味着背弃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天下荒年》里的共产党员个体形象也许并不丰满,但他们是特殊时期党的代表,他们是党的风雨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小说是活着的历史”。谈歌的作品通过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使历史细节变得更加真实、丰满,从而使读者可以借此对历史进行艺术真实意义上的还原。

还原真实丰满的历史细节

——浅议谈歌小说中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

文坛观察



人间至味是沧桑 ——评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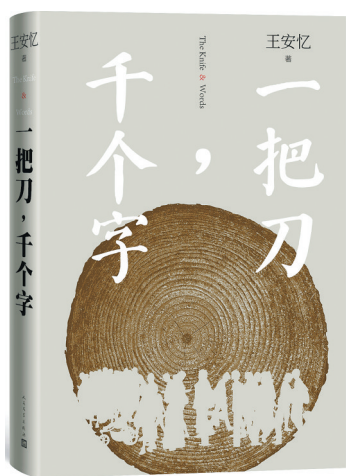
□黄山

王安忆用清代美食家、文学家袁枚创作的对联“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作为她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的题记,以我的理解,她是在“一语三关”。第一个意思是暗指她的这部长篇小说与美食、美食家、厨艺有关;第二个意思是暗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命运,而越是艰难困苦的环境越是能孕育出异彩纷呈的人生;第三个意思是隐喻着一把刀下塑造的千姿百态的美味佳肴是无穷无尽的,有无数个造型,内涵丰富,延绵不绝。王安忆把她这部长篇小说定名为《一把刀,千个字》,在笔者看来,也是大有深意:“一把刀”实质是指小人物陈诚个人的生活轨迹,“千个字”实质是指她人生中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关涉甚广。小说分“上部”“下部”“后来”三个部分,讲述了两个不同时空的故事:“上部”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讲起,主要讲述淮扬菜名厨陈诚的成长故事;“下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讲起,主要讲述主人公的家

世渊源、小时候模糊的记忆、遥远的东北、上海娘娘的亭子间;“后来”讲的就是“当下”主人公及其亲友的情形——“现状”被王安忆“一笔带过”,干脆利落落地结束了整部小说。

王安忆大量篇幅写的是“人间至味”,即美味佳肴,透露出的却是人生的“沧桑”。从寒冷的东北雪乡颠沛流离到上海,从上海费尽心思移民到大洋彼岸的纽约法拉盛;从拼命学习技艺的学徒到名扬纽约大都会宴会的大厨,“一把刀”的辗转腾挪到个人对命运的抗争。一个小人物的半生在动荡不安中寻求岁月静好,在身不由己的大环境下又被迫为谋生迎来送往。

是机缘巧合,也是命运安排,共同的困境却把生命中的另一半推给了主人公。奇妙的姻缘伴随着生存信念对人性的考验。一面是近百年包括特殊时代的



历史风烟,一面是油盐酱醋烹制的美味佳肴被端上现实的餐桌。王安忆善于把宏大的历史叙事浓缩到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几代人的悲欢离合里。时代在变,人的命运也在变。无论是血溶于水祖国家乡的亲人、乡邻,还是大洋彼岸一见如故的新朋友,都在车水马龙、人间烟火气中凝聚、消散、生生不息,却逝者不可追。

主人公的回沪奔丧之旅,使其唏嘘不已:“离开多年,却发现这里的人对他并不陌生,是因为嬢嬢,还有师师她们家吧。”然而,嬢嬢去世了。在故乡由旧车间旧厂改造的艺术展览,主人公忽然察觉到了“这地方他来过,就是爷爷带来洗澡的钢厂……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那眼泪,“不晓得蓄了多少时日,又是怎样的成分,滚烫的,烧得心痛”。这是王安忆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20万字的小说也在此戛然而止。

酿美以孤独 ——评韩联社散文集《人生总有孤独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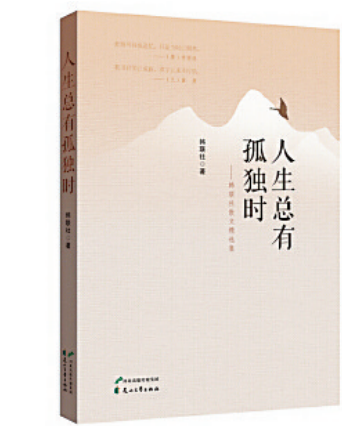
□王万举

读完散文家韩联社的《人生总有孤独时》(花山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才发现这个书名并不是文集集中某一篇文章的名字,这说明,作者是在对这些篇章的“反刍”时想定的。他在写这些篇章时一定是孤独的,而在编辑时,他又肯定了孤独的必然性。为什么生命个体甩不掉孤独?文学家们描写了很多,哲学家们分析了很多,也可以从文集集中的《父亲》《父亲,一路平安》《永远的遗憾》《嫂子》《弟弟说他回家》《小城无故事》等作品中领略。我以为,人终究是有情感的,正是一个“情”字造成了孤独与人如影随形。“情”从何来?“情”为何物?哲学美学都有明论,本文不再详议。但只要读完韩联社的这本散文集,你就会悟,情之所发便是情,或者把这句倒过来——孤独便是情之所发。无疑,这种心理状态是人与人的关系所造成,即便是那些面对山水而生的孤独,也完全是“睹物思人”。

肯定《人生总有孤独时》中对孤独必然性的肯定,是想说明这本书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情真意切。作家做到这四个字并不容易。你看那篇《勤英表姐》,其叙述的留白处浸透了泪水;你看那几篇“大学琐记”,充满了青春的热烈感怀;你看那篇《人在灵隐雨中》,“四顾茫然,悲欣交集”溢出纸外。一般地说,人与人之间最浓烈的感情是血缘亲情。这在《人生总有孤独时》的写作和编排上有清晰的体现。为什么救援者常常对正在走向轻生的人进行亲情的呼唤,就是为了唤起轻生者重生的情怀。正如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时,你可以说: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我是我亲人的亲人……这近似绕口令的回答正揭示了儒学的真谛——“礼”就是以血缘为根基的。散文集中由内而外、由人际而天人的“孤独行走”,实际上大大增强了本书的感染力。

如大家所熟知,情感是对对象和主体间某种关系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因人(写作者)、因事、因情境、因内在积淀和表达能力而异,作品也因此而分文野和高下。韩联社抓住了“孤独”,便把握住情之所发之“龙头”。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表达,因为艺术现阶段尚没有发

展到克罗齐所认为的“直觉”,艺术总是要达人的。韩联社散文具有鲜明特点是专家们的共识,这里也拿出两篇文章稍作分析。一篇是《那间颇具神圣色彩的422宿舍——大学琐记之三》。这篇文章在对初春的自然和人文气息充分渲染之后,加了一个“补记”和一个“又记”。“又记”说:“2017年9月23日,河北大学中文系77级入学40周年联谊会在保定隆重举行……已有九位同学驾鹤西行了……”在朝气充盈之中,在豪情铺陈之中,只这淡淡的一“记”,便把主题大大地深化了。青春美好但无限,韶华易逝却曾经拥有,个体生命正由于这个“存在”与不可长生的矛盾而生出许多情丝意缕。把全文前后联系起来读,怎能不生出万千慨然?另一篇是《人在灵隐雨中》。作者在文中写道:“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与某种浮躁喧嚣器相伴始终。”“一座灵隐寺,到底隐埋了多少人世烟雨?——这,正应了弘一大师叔同临终前手书的四个字:悲欣交集。”这最后一笔点得多么好啊!以上两文的基调无疑是感伤主义的,它带给读者的孤独已与怀恋亲情的篇章大有不同:它们已



将读者的心境由人际拉到了天人之际,从而引发对宇宙人生的深切感怀。这正是儒与庄的“接口”,它的心理特征已由怀念亲友的人世的功利性转向了审美的非功利性。作者也由此完成了“孤独”的整个心灵历程。认真品读韩联社的散文这还是第一次。韩联社作品是写实的、再现的、非煽情的,然而却十分有效地引导着我们,让我们沿着“儒一庄”路线孤独着作者的孤独。